

赤子其心 星斗其人

——怀念民进浙江省委原主委毛昭晰

□ 浙进宣

毛昭晰,1929年5月出生于浙江宁波,著名史前史学家、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被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曾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八届、九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浙江省委原主委。



毛昭晰



1993年,雷洁琼参加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开馆典礼时与毛昭晰合影

“赤子其心,星斗其人。烁烁其骨,芬芳其魂。路漫修远,终有道德,天奉吾师,夫复何求。”2023年1月5日,毛昭晰在杭去世,其学生——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民进浙江省委原副主委王旭烽写下这段感人文字,也道出了无数文博战线和民进组织的后继者们对毛昭晰的深切悼念。

“爱满民进”的践行者

“身姿挺拔,谈吐风趣,时不时来民进省委机关走走,和认识不认识的机关干部都能聊上几句的老先生。”这是毛昭晰留给大家的最初印象。

民进浙江省直文化支部的陈玉芳回忆,在毛昭晰70岁生日前夕,支部会员商量给他过生日,可刚好他有其他安排。不甘心的他们又“激将”道:“毛老师,我们支部的会员都很想您,您不会因为现在官大了,就看不起我们这些普通会员了吧?”这个激将法还真管用,毛昭晰随即回复:“你们真行,那我跟对方商量下,争取改个时间,先来跟大家聚聚。”每年的重阳节,毛昭晰无论多忙,也都要抽空来参加省直老会会员的联谊活动。他说,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回过头去看那些岁月时光时,很感慨在民进的生涯在其中占有了重要的份额,他始终为自己是民进的一员而感到骄傲。“民进最初对我的信任,我加入民进以后感到的温暖,以及我在民进的工作,都源于这个大家庭的爱。”“爱满民进”是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1983年6月,毛昭晰被任命为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但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介书生”,关系依然保留在学校,继续教书、上课、带研究生,在省文化厅和文物局工作,既不拿工资,也不拿奖金,是一个“义务兵”。

当时有好几个民主党派来做毛昭晰的工作,希望他能加入。后来,毛昭晰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中提到:“那时我做工作做得最多的党派就数民进了。浙江民进的同志非常热情,杨松森、郭锦春、徐云锦,他们前后一共来找了我八次,让我很受感动。我和民进省委副主委李天助先生的关系一直很好,当时他因为因病住院,我去看望他,在病床前整整两个小时,他握着我的手不放开,希望我能够参加民进。看着病床上的李天助先生,我实在不好意思不答应,于是就比较委婉地和他谈:‘李伯伯,让我回去考虑考’”

虑吧。”

2018年11月,在参加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民进浙江省委成立55周年座谈会时,毛昭晰回忆加入民进、开展工作的点点滴滴,由衷地说:“认识这么多的好同志、好老师,是我一辈子的幸运。”

正是因为浙江民进同志的热情和诚恳,让毛昭晰开始思考民主党派到底是怎样的组织,通过进一步的了解,毛昭晰觉得民进对他也比较合适。在民进这个组织中,有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许广平、谢冰心、傅雷、郑振铎、顾颉刚、蔡尚思、吴贻芳、雷洁琼等许多文化界的杰出人士;还有他所在学校的老师——翻译《小妇人》的郑晓沧、教授文字学课程的任铭善,他们也是浙江民进的会员。这么多优秀的学者,让他最终作出了加入民进的决定。

参加民进后,毛昭晰逐渐把自己熟悉的一些人也发展到民进这个组织中,其中有《采茶舞曲》的作者周大风,著名画家孔仲起、吴山明,浙江博物馆原馆长汪济英,蓝田猿人发掘的主持者、杭州大学教授戴尔俭,浙江自然博物馆原馆长蔡正全,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杭州大学图书情报专业教授白晓文,浙江大学教授、博导陈维雄,还有周永良、林华东、俞为浩等年轻学者。他们都是音乐界、美术界、文博界、学术界的优秀代表,加入民进后为浙江民进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不少后来还担任了民进省委会的领导职务。

担任两届主委期间,毛昭晰十分重视班子建设。他说,在这个和谐团结的集体中,没有人做“好好先生”,真正是通过民主的形式发表意见、开展讨论,进而不断地推进会务工作。他对地方领导班子的建设也很关注,经常到各个市级组织,向市级组织的同志学习、求教,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和问题,物色选拔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负责人,为之后浙江民进组织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文化遗产保护的“救火兵”

毛昭晰是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史专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建设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他被任命为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刚刚颁布,浙江的文保事业还没有从十年颠簸中走出来,面对人手少、资金缺的情况,毛昭晰

晰便是以他对文物保护事业近乎疯狂的执拗与顽强,为文化遗产保护呕心沥血,奔走呼号,践行着他“要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奋斗到底”的铮铮誓言。

毛昭晰在办公室的时间少,始终在路上、车上。只要是文物的事,不管哪里都要去。毛昭晰说:“我是来当‘救火队长’的。”

1984年,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厂为扩大再生产,决定拆除胡庆余堂古建筑。毛昭晰闻此新闻后非常震惊,胡庆余堂被誉为“江南药府”,其优秀的医药文化传统的价值是任何建筑无法取代的,怎么能拆?他马上赶到现场,找到胡庆余堂制药厂厂长予以制止。“胡庆余堂这么重要的文物,绝对不能拆啊!”厂长反问:“胡庆余堂不要发展?你能保证我们生产发展吗?生产要发展,破房子必须拆掉重建!”

劝说未果,毛昭晰焦急万分,他一边让文物局相关部门准备资料,将胡庆余堂申报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一边找到杭州市委领导多次反映,力陈保护这座“江南药府”的重要意义。1988年,胡庆余堂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毛昭晰视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所见景象使他非常痛心。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仅4户人家,到20世纪80年代已繁衍成两个村庄40多户和3个工厂,轰动世界的“古代水稻圣地”正在被蚕食。

一个省文物局局长,没有决定行政区域搬迁的权力。毛昭晰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突然,他想起对文物很重视的老省长李丰平,遂登门拜访。听了毛昭晰的汇报,李丰平坐不住了:“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现场座谈会召开了。会议决定,遗址现场的村庄和工厂限期搬迁,经费由省、市、县三级财政解决。更使毛昭晰振奋的是,就在这次会上,他关于建立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建议得到采纳。1993年,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毛昭晰还是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动者之一。2001年底,他在杭州市“中国运河文化研讨会”开幕式演讲中力陈运河沿岸的桥梁、码头、仓储建筑和历史街区的重要意义,呼吁要保护好这些运河文化的重要遗存。一个多月后,毛昭晰从报上读到小河直街仍在动迁居民的消息时,忍不住在病房里给时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写了一封长信,痛心疾首地呼吁“大运河文化遗存不能再拆了!”他的

呼吁和努力,深深打动了当时的杭州市委领导。次年,大运河综合保护工程列入城市建设的“十大工程”,提出“还河于民、申报世遗、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三大目标,按照“严格保护”的原则,做好大运河杭州段的保护工作。2007年,被誉为“最后的天下粮仓”的富义仓,在原有的占地范围,用原有的材料,按原有的历史风貌,原汁原味地进行了修复。小河直街经保护、修缮、整治后也迎回了百分之六十多的老街坊。这一片成为大运河畔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典范,和一道独特的运河文化风景,为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次次“救火”,毛昭晰抢救下许多文物——黄龙洞边上的护国仁王禅寺遗址、宁波的张苍水故居,绍兴的秋瑾烈士纪念碑,还有杭州求是书院、郭庄、沙孟海故居、刘大白墓、张宪资福庙、嵊州古城墙,海宁王国维故居,桐乡乌镇修真观戏台……

提出创办文博专业

毛昭晰也是新中国最早提出要创办文博专业的人。1978年恢复高考不久,他倡议在杭州大学开设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历经三年奔走,1981年,杭大文博专业成立,毛昭晰亲自去招生,为浙江文博事业发展奠定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基础。1983年,在主持浙江省文物局工作后不久,他提出应在浙江省建立丝绸博物馆、茶叶博物馆等一系列专题博物馆和在市县建立博物馆,并大力促成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龙泉青瓷博物馆的建立,为浙江文博事业打好了基础。他以极大热情和实干精神推动着浙江文博事业蓬勃发展,使浙江成为博物馆大省。

毛昭晰总是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有文化遗产就有了历史,有了研究价值,有了记忆、审美、旅游和观光价值。晚年,即使卧床养病,他也时刻关注着文物工作的最新动态。当谈到文博事业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毛老的眼睛亮了,他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愿望,是我希望看到的。”



九三学社在北平《新报》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宣言》影印件

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学座谈会”,当时的参加者有数十人,他们既是爱国者、探索民主与科学的救国者,也是一批在各个领域都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针砭时弊,积极建言献策。1945年9月3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许德珩等领导人经商议决定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许德珩是五四运动中的一名学生领袖,他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大力倡导“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许德珩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友谊,其夫人劳君展与毛泽东是老乡,当年加入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1945年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平谈判时,毛泽东亲自拜访许德珩夫妇,鼓励他们将来“九三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1946年,在五四运动纪念日前夕,九三学社召开了成立大会,于是一个有着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民主党派诞生了。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倍感振奋,纷纷响应。当时,在北平国统区的九三学社负责人深受鼓舞,也秘密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响应“五一口号”,并由许德珩起草“宣言”。但由于九三学社负责人与中共在国统区地下工作负责同志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共希望九三学社在地下工作方面有所作为,因此,九三学社没有立即公开响应“五一口号”。

1949年1月26日,北平和解放之际,九三学社在北平《新报》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宣言指出:“本社自对日战争结束以后,即主张以政治协商方式,解决中国内政问题之唯一途径,数载以来,本此目的,奋斗不懈,早为世人所见。不幸政治协商会议为国民党反动派一手撕碎,内战延至今,殊堪痛惜。去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无党派参加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本年一月十四日,中共毛泽东先生复宣布和平八项主张,同人等认为唯有循此途径,始可导中国于民主、自由、富强、康乐之境,愿共同努力,以求实现。”从中可以看出,九三学社自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作者单位:九三学社上海市宝山区委会)

九三学社响应『五一口号』的初心

□ 沈勇民

台盟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爱国心声

——苏子蘅、林铁铮科技报国往事

□ 徐丹

在风清气蓝的大连有一片被绿树环绕的楼群,这就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这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科研机构之一。她在国家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急国家所急,为经济建设、国防安全和科技事业创新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子蘅、林铁铮是曾在大连化物所工作的台盟盟员,他们怀着忠诚爱国、无私奉献的情怀,践行着科技报国的使命,用奋斗谱写了一篇篇感人篇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能源紧缺,石油工业十分落后,液体燃料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国防和工农业生产。大连化物所的科研人员围绕“国家急需”,在人造石油、石油化工和国防领域完成多项攻关任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苏子蘅:用科技奉献革命

苏子蘅,1905年出生于日据时代的

台湾省彰化县,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屈辱生活给少年时代的苏子蘅留下了深深记忆。在赴日本留学期间,他一边学习先进科学知识,一边积极参加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认识。苏子蘅认识到“要解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制下喘不过气的祖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不懈的革命斗争”。1928年,苏子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立志“以科技知识,奉献革命奉献党”。1941年苏子蘅去了延安。1945年后,苏子蘅进入华北解放区从事科研工作,重点对药物及弹药用的重要有机化工原料“醋酐”进行研究,同时继续从同乡、同事、学生中动员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参加建设。

1949年,苏子蘅作为第一批科技人员加入大连化物所有机化学研究室。关于“有机化学”,原化物所所长包信和院士

是这样介绍的——建所以来,大连化物所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和服务国家经济的过程中,发展和形成了物理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化学工程四大优势学科,科学大家辈出,研究实力雄厚,研究所也成为国内科技界的典范和旗帜。可见,苏子蘅担任首任负责人的有机化学研究室在化物所占重要地位。1952年后,苏子蘅调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数理化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感光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在培养科研人才、开展科研工作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林铁铮:矢志不渝地奉献

林铁铮,台盟盟员,1923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家学深厚,自小便热衷于科学,但在那个台湾被日本占据的年代,个人前途被严格限制。林铁铮深信“唯有实业才能救国”,因此拒绝了家人

提供的学医机会,坚持选择了当时无人问津的理工科。几经周折,他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应用化学专业学习。留学期间,林铁铮经历着贫困、挨饿和因陋就简的实验条件,他半工半读,利用在肥皂厂兼职的微薄收入购买药品与器具开展实验,咬紧牙关坚持完成了毕业论文,并获得优秀。

1955年,周恩来总理呼吁海外留学生回国参与建设新中国。林铁铮与家人响应号召,回到祖国。1956年,中国科学院派苏子蘅与他交流,希望他加入研究所。提起这段往事,林铁铮自述道:“10月1日,我和家人受邀以贵宾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两周后,我与科学院事务局负责人见面,因当时尚不会说中国话,仅能用英语勉强沟通。后来科学院派了前辈苏子蘅来见我,才得以深入交流。我出生南方,原本希望到南方的科学院化学所工作,但当时机会较少,希望我到北方工

作。后来,科学院人员陪我到长春市的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和旅大的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参观。长春冬季酷寒,旅大虽同样位于东北,但三面环海冬天较为不冷。苏先生(苏子蘅)告诉我,旅大市内还有几十户台胞,我和妻子商量后便选择到旅大市石油研究所就职。”当年11月,林铁铮被任命为化物所首任有机元素分析组组长,开展页岩油相关研究,他还成立了有机标准物合成小组。在1962年所内航空煤油会战中,他带领有机元素分析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林铁铮和研究组开展的“QG自动催化物采发生器的研制”项目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二等奖、国家科学研究三等奖等荣誉。林铁铮在化物所工作至退休,兢兢业业地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他指导学生也

是春风化雨谆谆教诲,林铁铮经常督促学生学习外语,并积极推荐大家到国外参加会议、留学等,他指导的多名研究生,如今已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林铁铮说:“我生长在殖民与大战的动荡年代,立志毕生从事科学研究,虽然主观上努力与能力欠缺,客观上恶劣环境影响,而没能达到理想与目标,但我的人生并非毫无意义。在风云迭起的年代,我勉励自己做激流上一叶不覆灭的小舟,矢志不渝,平凡奉献。”这段话道出了老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心声。

(作者单位:台盟大连市中山区支部)

